

礼乐文化涵育国家形象认同的教育机理与实践路径

孙梦青¹, 张强^{2,3}

1.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河南郑州;
 2. 郑州大学, 河南郑州;
 3. 郑州西亚斯学院, 河南郑州
- DOI: 10.62836/jer.v4n6.1252

摘要: 国家形象认同是增强文化自信、凝聚国家共识的重要基础,也是新时代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内容。礼乐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精神标识,蕴含丰富的价值理念、情感资源和育人智慧,为国家形象认同教育提供了深厚文化基础。文章立足教育学视角,探讨礼乐文化与国家形象认同的内在关联,分析礼乐文化涵育国家形象认同的教育机理。研究认为,礼乐文化通过符号认知、情感共鸣、价值内化和身份建构四重机制,推动个体实现从文化认同到国家认同、再到国家形象认同的递进转化。其中,身份建构机制是国家形象认同生成的关键环节,也是礼乐文化育人功能发挥的重要体现。当前礼乐文化涵育国家形象认同仍面临文化资源教育转化不足、情境体验相对薄弱以及数字传播适应性有待提升等现实问题。为此,应从课程建设、仪式教育、校园文化和数字传播等方面构建协同育人体系,不断提升国家形象认同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关键词: 礼乐文化; 国家形象认同; 中华文明精神标识; 国家认同教育; 身份建构

Educational Mechanisms and Practical Pathways of Ritual-Music Culture in Fostering National Image Identification

Mengqing Sun¹, Qiang Zhang^{2,3}

1. North China University of Water Resources and Electric Power, Zhengzhou, Henan;
2.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Henan;
3. Zhengzhou Sias University, Zhengzhou, Henan

Abstract: National image identification is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strengthening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consolidating national cohesion, and it has become a significant component of moral education and national image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As a major spiritual symbol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ritual-music culture embodies rich values, emotional resources, and educational wisdom, providing profound cultural support for national image identification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ducational studie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ntrinsic relationship between ritual-music culture and national image identification and examines the educational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ritual-music culture fosters national image identification. The study argues that ritual-music culture promotes

*基金项目: 2024年度河南省软科学项目“朝贡体系下古代中国—东南亚礼乐传播与国家形象研究”(项目编号242400410326)。

作者简介: 孙梦青, 博士, 副教授; 张强, 博士, 教授。

a progressive transformation from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to national identification and ultimately to national image identification through four interrelated mechanisms: symbolic cognition, emotional resonance, value internalization, 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 Among them, identity construction serves as the key mechanism linking cultural identity with national image identification. At present, the educational function of ritual-music culture is constrained by insufficient educational transformation of cultural resources, limited experiential participation, and inadequate adaptation to digital communication environment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build a coordinated educational framework integrating curriculum development, ritual-based education, campus culture construction, and digital communication so as to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national image identification education.

Keywords: ritual-music culture; national image identification; spiritual symbol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national identity education; identity construction

1 引言

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文化品格和价值理念的集中体现，不仅影响国际社会对国家的认知与评价，而且关系国家认同、文化认同和社会凝聚力的形成。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提炼展示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国家形象建设因此不仅是国际传播的重要议题，也是新时代教育工作的重要任务。如何依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增强青年群体的国家认同和国家形象认同，成为当前教育研究亟待回应的重要课题。

礼乐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长期文化实践中形成的精神标识和价值载体。近年来，学界围绕礼乐文化的文明特质、思想内涵和时代价值展开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礼乐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根基，其核心在于通过礼制规范与乐教涵育实现社会秩序建构和人格培养[1]。礼乐文化构成了中国传统审美精神的重要来源，并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2]。礼乐文化在新时代仍具有培育社会责任感、增强文化认同和促进国家认同的重要功能[3]。

与此同时，国家形象研究逐渐从传播学领域向文化研究、教育研究和国家治理研究拓展。新时代

国家形象塑造既是国家软实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路径[4]。中华文明精神标识是国家形象建构的重要文化资源，应推动其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表达[5]。中华文明精神标识能够通过历史与现实、民族与世界、传统与现代的多重联结融入国家形象建构过程[6]。在教育领域，国家形象建构不仅体现在国际传播层面，也体现在教材体系和教育实践之中，是青年国家认同培育的重要内容[7]。

现有研究为理解礼乐文化和国家形象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但仍存在两方面不足：一是关于礼乐文化的研究多集中于历史阐释、文化传承和美育价值层面，对于其在国家形象认同教育中的作用机制关注不足；二是国家形象研究更多聚焦国际传播和国家叙事，缺乏从教育学视角探讨国家形象认同生成过程的系统分析。事实上，国家形象认同并非单纯的信息接受过程，而是个体在文化学习、情感体验和价值内化基础上形成的身份认同过程。礼乐文化兼具价值规范、情感涵育和人格塑造功能，与国家形象认同教育具有天然契合性。

基于此，本文立足教育学视角，在中华文明精神标识与国家形象建构的时代背景下，探讨礼乐文化与国家形象认同之间的内在关联，分析礼乐文化涵育国家形象认同的教育机理，并提出相应实践路

径，以期为新时代国家认同教育和国家形象建设提供理论参考。

2 礼乐文化与国家形象认同的理论耦合

2.1 礼乐文化的精神标识属性

礼乐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文明绵延发展的重要精神标识。作为中国古代社会治理和人格培养的重要文化形态，礼乐文化并非单纯的礼仪制度或音乐艺术，而是集价值规范、道德教化、审美熏陶与社会整合于一体的文化体系。孔子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强调礼乐对于人格养成和社会秩序建构的重要作用；《礼记·乐记》则从“礼以节人，乐以和人”的角度揭示了礼乐文化规范行为与涵养情感的双重功能。礼乐文明由此成为中华民族崇礼尚和、协和万邦文化品格的重要来源。

从文明发展的角度看，礼乐文化蕴含着中华民族对理想社会秩序、人际和谐关系以及美好精神生活的持续追求。先秦礼乐文明以伦理秩序建构为核心，以人格教化为路径，通过礼与乐的协同作用实现社会整合和文化认同[1]。礼乐文明不仅塑造了中华文明的发展形态，而且在历史演进过程中不断实现自我更新和创造性转化[8]。可以说，礼乐文化所倡导的和而不同、礼义诚信、协和万邦等价值理念，已经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之中。

新时代背景下，礼乐文化的价值不仅体现在传统文化传承层面，更体现在中华文明精神标识建构层面。中华文明精神标识集中体现了中华文明的思想特性和精神特征，是国家形象建构的重要文化资源[6]。礼乐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承载着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也体现着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因此，礼乐文化不仅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文化遗产，也是新时代展示中国国家形象的重要精神资源。

国家形象的形成既依赖国家发展的现实成就，也依赖文化价值的持续表达。中华文明精神标识是展现中国国家形象的重要叙事资源，通过文化符号的创造性转化能够增强国家形象的文化辨识度和国

际影响力[5]。礼乐文化所蕴含的和合共生、天下为公、协和万邦等思想，与新时代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高度契合性。正因如此，礼乐文化能够超越单纯历史文化资源的意义，成为连接中华文明传统与国家形象建构的重要文化纽带。

2.2 国家形象认同的教育学意蕴

国家形象通常是社会公众基于对国家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文化传统和国际行为等方面的综合认知而形成的总体评价。随着国家形象研究的不断深化，其内涵已经超越传统传播学范畴，逐渐延伸至文化认同、价值认同和公民教育领域。国家形象不仅是国家综合实力的外在呈现，也是凝聚国家认同和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精神资源[4]。

国家形象认同是个体在认识国家、理解国家和归属国家过程中形成的稳定心理倾向和价值认同。从教育学视角来看，国家形象认同不仅涉及对国家发展成就、文化传统和制度优势的认知，更体现为个体对国家价值理念、历史记忆和共同体身份的接受与认同。因此，国家形象认同本质上是一种教育生成过程，其形成离不开文化传承、价值引导和社会化培育的持续作用。

国家形象认同具有显著的层次性特征。首先表现为认知层面的国家理解。个体通过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以及媒介传播等渠道了解国家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发展，形成对国家形象的基本认识。其次表现为情感层面的国家归属。个体在文化体验和社会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对国家的情感依恋和心理认同。最后表现为价值层面的身份确认。个体将国家倡导的价值理念内化为自身价值追求，并在实践活动中体现维护国家形象的自觉意识。国家形象教育不仅承担知识传递功能，更承担价值塑造和身份建构功能，其最终目标在于培养具有国家认同意识和责任意识时代新人[9]。

从国家形象形成机制来看，文化认同是国家认同的重要基础，而国家认同又是国家形象认同的重要前提。文化传播能够通过促进文化认同和价值共识推动国家形象建构[10]。国家形象认同并非单纯依赖信息传播形成，而是在文化认同不断深化过程

中逐步生成。换言之，只有当个体真正认同中华文化所蕴含的价值理念和精神品格时，国家形象认同才具有稳定的情感基础和价值基础。

新时代国家形象建设被赋予更加鲜明的文化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史学伟等认为，新时代国家形象塑造既面向国际社会，也面向国内公众，其核心在于增强国家认同、文化自信和民族凝聚力[4]。因此，国家形象认同教育不仅是国家形象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内容。

礼乐文化与国家形象认同教育之间具有天然契合性。一方面，礼乐文化承载着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和文化传统，是国家形象的重要文化表征；另一方面，礼乐文化兼具价值规范、情感涵育和人格塑造功能，能够促进个体实现从文化认同到国家认同、再到国家形象认同的逐步深化。因此，从教育学视角考察礼乐文化涵育国家形象认同的内在机理，不仅有助于深化国家认同教育研究，也有助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3 礼乐文化涵育国家形象认同的教育机理

礼乐文化涵育国家形象认同并非简单的文化传播过程，而是一个由认知、情感、价值到身份逐步深化的教育过程。从认同生成规律来看，个体通常经历“认知理解—情感接受—价值认同—身份建构”的发展路径，最终形成稳定的国家形象认同。礼乐文化所蕴含的文化符号、审美资源、价值理念和共同体意识，恰好能够对应认同生成的不同阶段。因此，可以从符号认知、情感共鸣、价值内化和身份建构四个维度，系统分析礼乐文化涵育国家形象认同的教育机理。

3.1 符号认知机制：礼乐文化促进国家形象认知生成

国家形象认同首先建立在国家文化符号认知基础之上。认同理论认为，文化符号是共同体意识

形成的重要媒介，个体通过识别、理解和接受文化符号，逐步形成对文化共同体的认知归属。礼乐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精神标识，蕴含丰富的文化符号资源，包括礼仪制度、传统乐舞、节庆仪式、经典文献以及“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等价值理念。这些文化符号不仅是中华文明发展历程的重要见证，也是国家形象的重要文化表征。

中华文明精神标识能够通过符号表征和价值引领作用，帮助社会成员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脉络和精神特质[6]。中华文明精神标识是国家形象建构的重要叙事资源，其价值在于增强国家形象的文化辨识度和国际传播力[5]。礼乐文化正是这一精神标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教育活动是礼乐文化符号转化为国家形象认知的重要桥梁。通过课程教学、文化体验和仪式实践，学生能够在理解礼乐文化内涵的过程中认识中华文明的发展逻辑和精神品格，进而形成对中国国家形象的整体认知。因此，礼乐文化通过文化符号的识别、理解与阐释，实现了从文化认知向国家认知的教育转化，为国家形象认同奠定认知基础。

3.2 情感共鸣机制：礼乐文化激发国家形象情感认同

国家形象认同的形成不仅依赖理性认知，更离不开情感层面的认同与归属。教育研究表明，认知能够帮助个体理解国家，而情感则决定个体是否愿意主动接近、认同并维护国家形象。因此，从认知认同走向国家形象认同，必须经历情感认同的生成过程。

礼乐文化的重要特点在于兼具理性教化与情感陶冶功能。《乐记》提出“乐者，德之华也”，强调音乐和审美活动能够调节情感、涵养德性，实现价值观念的潜移默化。与单纯知识教育相比，礼乐文化更容易通过审美体验和情感互动建立文化认同基础。中国传统礼乐文化中的“乐”兼具审美意涵与社会功能，其重要价值在于通过审美体验实现社会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结和价值共鸣[11]。这种基于共同情感体验形成的文化联结，为国家形象认同提供了重要情感基础。

从认同生成规律来看，共情是情感认同形成的重要中介。国家形象认同往往经历“认知共情—情感共情—价值共情”的递进过程，情感共鸣是实现价值认同的重要桥梁[8]。美育活动能够通过塑造共同情感结构增强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进而提升国家形象认同水平[7]。礼乐文化所蕴含的传统乐舞、节庆礼仪、诗乐经典以及仪式活动，本质上都是情感教育的重要载体。个体在参与礼乐实践过程中，不仅能够感知中华文化的审美价值，而且能够在共同参与和共同体验中形成对民族文化的情感依恋。

从教育实践角度看，礼乐文化的情感涵育功能主要体现为对文化归属感和国家认同感的培养。学校通过礼仪教育、传统节庆活动、经典诵读和音乐审美教育等形式，将抽象的国家形象转化为具体可感的文化体验，使学生在审美熏陶和文化参与过程中逐渐形成对中华文化的情感认同。随着文化认同不断深化，国家形象不再是抽象的政治符号，而成为承载文化记忆和价值情感的重要象征。由此，礼乐文化实现了从文化情感向国家情感的教育转化，为国家形象认同提供了持续稳定的情感支撑。

3.3 价值内化机制：礼乐文化强化国家形象价值认同

国家形象认同不仅体现为对国家的认知理解和情感归属，更体现为对国家价值理念和发展道路的认可与接受。教育的根本任务在于价值塑造，因此国家形象认同教育最终需要落实到价值认同层面。只有当国家倡导的价值理念转化为个体稳定的价值追求时，国家形象认同才能获得持久发展动力。

礼乐文化自形成之初便承担着价值教化的重要功能。中国传统礼乐思想强调“礼以立序，乐以和心”，通过礼的规范作用和乐的感化作用实现个体品德养成和社会价值整合。礼乐文明的核心在于通过礼乐教化塑造社会成员共同遵循的价值规范和行为准则[1]。礼乐文化在新时代仍然具有培育责任意识、公共精神和国家意识的重要价值，其本质在于促进社会共同价值的形成与传承[3]。

从国家形象建构角度看，国家形象本质上是一

种价值形象。新时代中国国家形象塑造的重要目标在于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其核心支撑在于中华文化价值体系的持续传播和广泛认同[4]。国家形象之所以能够获得社会认同，根本原因在于其所承载的价值理念获得了公众认可。因此，国家形象认同教育不仅要传播国家形象，更要引导学生理解国家形象背后的价值逻辑。

礼乐文化所倡导的仁爱、诚信、和谐、责任、天下为公等价值理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深层契合性。通过课程教学、行为规范和校园文化建设等方式，这些价值理念能够逐渐内化为学生稳定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当礼乐文化所蕴含的价值精神转化为个体价值追求时，国家形象所承载的文化理念和价值内涵也更容易获得认同。因此，礼乐文化通过价值引导和价值塑造实现了从文化价值认同向国家价值认同的转化，为国家形象认同奠定了坚实的价值基础。

3.4 身份建构机制：礼乐文化实现国家形象认同转化

如果说符号认知解决的是“认识国家”的问题，情感共鸣解决的是“热爱国家”的问题，价值内化解决的是“认可国家”的问题，那么身份建构则解决的是“成为国家共同体成员”的问题。从教育学视角看，国家形象认同的最终形成并不表现为简单的认知接受或情感认同，而表现为个体将国家形象纳入自我身份认知体系之中，实现从“认识国家”到“认同国家”、再到“以国家共同体成员身份理解自我”的转变。

礼乐文化具有鲜明的共同体建构功能。礼乐活动通过共同仪式、共同体验和共同价值建构，使社会成员形成稳定的共同体意识和群体归属感[12]。礼乐不仅是维系社会秩序的重要机制，更是塑造集体身份的重要文化力量。从这一意义上说，礼乐文化本质上是一种身份建构资源，其通过文化实践不断强化个体与民族共同体、国家共同体之间的联结关系。

国家形象认同的深层逻辑同样体现为共同体身份建构。国家形象建构并非单纯的传播行为，而

是文化认同、价值认同和共同体认同不断累积的结果[10]。当个体对中华文化形成稳定认同后,这种文化认同将进一步转化为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并最终表现为对国家形象的主动维护和积极传播。因此,国家形象认同本质上是一种身份认同,而不仅是态度认同。

新时代国家形象建设强调从“他塑”向“自塑”转变。国家形象塑造不仅依赖国家层面的叙事表达,更依赖社会公众主动参与国家形象建构过程[13]。所谓“自塑”,其前提就在于公众将国家形象视为自身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国家形象成为个体身份认知的重要内容时,个体便会自觉承担维护国家形象、传播国家形象的责任,从而实现国家形象认同由外部认知向内部认同的根本转变。

礼乐文化所蕴含的家国同构、协和万邦、天下为公等思想,为国家共同体意识培育提供了深厚文化基础。通过礼乐教育,学生不仅能够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传统和价值精神,而且能够在文化认同、情感认同和价值认同基础上形成稳定的国家身份意识。至此,礼乐文化完成了从文化认同到国家认同、再到国家形象认同的层层递进,实现了国家形象认同的教育转化。可以说,身份建构机制是符号认知、情感共鸣和价值内化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是礼乐文化涵育国家形象认同最具根本性的教育机制。

4 礼乐文化涵育国家形象认同的现实困境

礼乐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精神标识,为国家形象认同教育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然而,从当前教育实践来看,礼乐文化在国家形象认同培育中的育人效能尚未得到充分发挥,其原因既与传统文化资源转化不足有关,也与教育实践方式和传播环境变化密切相关。

4.1 文化资源的教育转化深度不足

当前学校教育中的礼乐文化内容主要分布于语文、历史、艺术和思政等课程之中,教学重点多集

中于历史知识和文化常识层面,对礼乐文化所蕴含的国家精神、文化品格和时代价值挖掘不够。部分教育实践仍然停留在传统文化知识传播阶段,缺乏从礼乐文化到国家认同、再到国家形象认同的系统设计,导致礼乐文化的教育价值未能充分转化为国家形象认同教育资源。

从根本上看,礼乐文化教育与国家形象教育之间尚未形成有效衔接机制。礼乐文化研究关注文化传承,国家形象研究关注传播效果,而教育实践层面对两者融合发展的探索相对不足。这种结构性分离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礼乐文化涵育国家形象认同的整体效能。

4.2 情境体验与情感参与相对薄弱

国家形象认同的形成不仅依赖知识学习,更依赖情感体验和文化参与。然而当前礼乐文化教育仍以课堂讲授为主,体验式、参与式和沉浸式教育活动相对不足。礼仪实践、传统节庆、乐舞体验以及经典诵读等活动开展深度有限,学生难以在真实文化情境中感受礼乐文化的价值意蕴。

国家形象认同需要经历认知共情、情感共情和价值共情的递进过程[8]。如果缺乏情感参与和文化体验,认知层面的文化知识便难以转化为稳定的国家认同和国家形象认同。因此,如何增强礼乐文化教育的体验性和参与性,已经成为提升国家形象认同教育实效的重要问题。

4.3 数字时代传播适应性有待提升

随着数字媒介深度融入青年群体日常生活,国家形象认同的形成越来越受到网络空间和数字文化环境影响。相比数字媒介传播方式的快速发展,礼乐文化教育仍然较多采用传统传播形式,数字化表达、场景化呈现和互动化传播相对不足。

青年群体的国家认同越来越依赖文化符号、情感表达和媒介参与的协同作用[14]。在新的传播环境下,如果礼乐文化不能有效融入青年群体熟悉的话语体系和媒介生态,其育人效果将受到一定限制。因此,推动礼乐文化数字化传播和青年化表达,已经成为国家形象认同教育创新发展的

现实要求。

5 礼乐文化涵育国家形象认同的实践路径

针对礼乐文化涵育国家形象认同面临的现实问题，应立足新时代国家形象建设需求，构建课程教学、仪式教育、校园文化与数字传播协同推进的育人体系，推动礼乐文化由传统文化资源向国家形象认同教育资源转化。

5.1 以课程建设夯实国家形象认同的认知基础

课程体系是国家形象认同教育的重要载体。应充分发挥语文、历史、艺术和思政课程的协同育人作用，系统挖掘礼乐文化中的家国情怀、礼义精神和和合理念，引导学生在理解中华文明发展历程的基础上认识中国国家形象的文化根基。

同时，应推动礼乐文化融入教材建设和课程资源开发。教科书中的国家形象建构本质上是国家认同培育的重要过程[7]。因此，应加强礼乐文化与国家形象教育内容的整合，推动文化知识教育向国家认同教育延伸，不断夯实国家形象认同的认知基础。

5.2 以仪式教育强化国家形象认同的情感体验

礼乐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实践。应充分发挥仪式教育在情感涵育方面的独特优势，将传统礼仪、节庆文化和校园仪式有机融入教育实践。通过成人礼、毕业礼、传统节庆活动以及经典礼乐展演等形式，增强学生的文化参与感和情感体验感。

仪式活动不仅能够增强文化记忆，而且能够强化共同体意识和国家认同。通过礼乐实践活动营造共同体验空间，有助于将抽象的国家形象转化为具体可感的文化体验，从而促进国家形象认同的情感生成。

5.3 以校园文化促进国家形象认同的价值内化

校园文化是国家形象认同教育的重要场域。应将礼乐文化融入校园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建设之中，通过礼乐文化主题活动、传统文化社

团建设以及校园礼仪规范等形式，营造具有中华文化特色的育人环境。

礼乐文化的重要价值在于培育责任意识和公共精神[3]。因此，应充分发挥校园文化的隐性教育功能，使礼乐文化所倡导的诚信、责任、和谐等价值理念逐步内化为学生稳定的价值追求，推动文化认同向国家认同转化。

5.4 以数字传播拓展国家形象认同的实践空间

数字时代背景下，国家形象认同教育需要主动适应青年群体媒介使用方式变化。应积极运用短视频、数字展演、虚拟现实和网络互动平台等新媒体技术，创新礼乐文化传播形式，增强其可视化、场景化和互动化特征。

同时，应鼓励青年群体参与礼乐文化内容生产和国家形象传播实践，实现从文化接受者向文化传播者的角色转变。新时代国家形象建设需要实现由“他塑”向“自塑”的转变[13]。通过数字传播赋能礼乐文化教育，有助于增强青年群体国家形象认同的主体意识和实践能力，推动国家形象认同教育由课堂空间向社会空间延伸。

6 结语

国家形象认同既是国家形象建设的重要基础，也是新时代国家认同教育的重要内容。礼乐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精神标识，不仅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和价值追求，而且蕴含丰富的教育智慧和育人资源。从教育学视角来看，礼乐文化能够通过符号认知、情感共鸣、价值内化和身份建构等机制，促进个体实现从文化认同到国家认同、再到国家形象认同的逐步深化。其中，身份建构机制将文化认同、价值认同与共同体认同有机统一，构成礼乐文化涵育国家形象认同的核心逻辑。

面对全球化传播格局和数字化媒介环境的深刻变革，国家形象认同教育既需要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需要回应青年群体认同生成的新特点。推动礼乐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仅有助于增强青少年的文化自信和国家认同，也有助于将中华文明精神标识转化为国家形象建构的重要文化资

源。未来应进一步加强礼乐文化与课程体系、校园文化、社会实践以及数字传播的深度融合,构建多主体协同、多场域联动的国家形象认同教育体系,为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提供坚实的文化支撑和教育保障。

参考文献

- [1] 邹英都.先秦礼乐文明的特质与要义[J].人民论坛,2026(4):105-108.
- [2] 郭勇健.礼乐文化与中国传统美学[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57(2):109-120,181.DOI:10.16382/j.cnki.1000-5579.2025.02.012.
- [3] 兰甲云.传统礼乐素养培育与新时代礼乐文化建设路径[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62(6):43-51.DOI:10.16783/j.cnki.nwnus.2025.06.005.
- [4] 史学伟,张婷.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形象塑造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核心要义与实践理路[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5,23(2):18-27.DOI:10.16255/j.cnki.11-5117c.2025.0022.
- [5] 张鹏程,王林平.中华文明精神标识融入国家形象建构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J].学术探索,2025(6):61-69.
- [6] 刘艳房,吴莹.中华文明精神标识融入国家形象建构的三重向度[J].河北学刊,2026,46(3):181-188.
- [7] 钱旭升,朱晓娟.新时代教科书中的国家形象建构研究[J].课程·教材·教法,2025,45(10):49-55.DOI:10.19877/j.cnki.kcjcf.2025.10.008.
- [8] 潘斌.论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以中华礼乐文明创新性的历史脉络及特征为中心[J].社会科学战线,2025(12):30-39.
- [9] 周昆.教科书中国家形象的价值逻辑、教育意涵与育人实现[J].课程·教材·教法,2025,45(7):87-93.DOI:10.19877/j.cnki.kcjcf.2025.07.007.
- [10] 汪长明.从“文化形象”到“国家形象”:“一带一路”传统文化传播与中国国家形象建构[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5,29(3):119-128.DOI:10.19411/j.cnki.1007-7030.2025.03.010.
- [11] 付林鹏.古代礼乐文化中的“乐”:审美意涵与社会功能的交融[J].人民论坛,2025(21):105-109.
- [12] 周怡帆,徐若寒.“叙事—共情”视角下融合视听提升国家形象的双效逻辑[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5,47(12):101-110,132.DOI:10.19997/j.cnki.xdcb.2025.12.009.
- [13] 于洋,周璐瑾.新时代社会美育与国家形象的视觉构建[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1):1-10.DOI:10.16164/j.cnki.22-1062/c.2026.01.001.
- [14] 王晓俊.中国上古“礼乐认同”的音乐政治学审视[J].中国音乐,2025(4):34-48.DOI:10.13812/j.cnki.cn11-1379/j.2025.04.003.

